

● 王文勋 张文颖

#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对梁启超的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给整个亚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先觉们也积极学习、探索将其成功经验运用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明治维新时期舆论的作用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深深体会到舆论的重要性,为中国发动维新运动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无论在国内还是流亡国外,不管处境如何,他都坚持舆论活动,长期引导着当时中国的舆论,是当之无愧的舆论领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舆论之骄子”。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他都可称为我国舆论界的先驱,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一

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大力宣传维新思想,积极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兴办学堂,以推动维新变法的实施。在维新变法的领袖中,梁启超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很大,他一生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日本度过的,<sup>①</sup>他高度评价日本明治维新,并把其作为学习的楷模,探索将日本成功的经验运用于中国,掀起了国内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高潮。

在学习日本的过程中,明治维新时期舆论所起的作用对梁启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深深体会到舆论的重要性,为中国发动维新运动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1895年,梁启超参加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主持的《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的编辑工作,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1896年又担任了《时务报》主笔,以文思敏捷、才华横溢闻名国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前对日本新文化即当时称之为“东学”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他的老师康有为和第一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康有为曾经开设过一

门课程叫《万国政治沿革得失》,那时,他把《日本变政考》作为授课内容。<sup>②</sup>这本书对梁启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写的《变法通议》中,也提倡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跟老师康有为的书有很大关系。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对梁启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梁启超读了此书后,了解到日本之所以强大的原因。梁启超认为日本之所以能从弹丸小国变成今之雄国,是实行了变法维新,如果中国也像日本那样变法图强,也会摆脱弱国局面。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到达日本后,他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在日本期间,日本报纸舆论兴盛,这对梁启超影响很大。他1910年所写的《双涛阁时事日记》中,每天的功课有“读报纸”一项。梁启超在阅读日本报纸的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已经感受到报刊的强大舆论宣传作用,决心自己办报,宣传民权自由,介绍西方进步理论,抨击满清政府,启蒙国内民众。由于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身在日本,受日本报刊的影响颇多,其中,受当时日本最大的综合性杂志《太阳》影响尤甚。其栏目、设计、内容等方面都有模仿的痕迹。“梁启超认真汲取《太阳》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模仿,从而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综合性杂志。可以说,正因为有了《太阳》这一新型样板,才有了《清议报》向《新民丛报》的过渡与飞跃。”<sup>③</sup>

## 二

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居留地创办了《清议报》,力倡民权、自由,以图强国。1903年其主要的文章被结集汇编成《清议报全编》,被国内



梁启超

一些书局秘密翻印,促进了报纸在国内的传播,影响更为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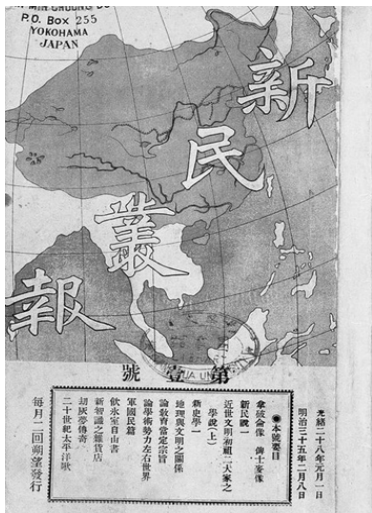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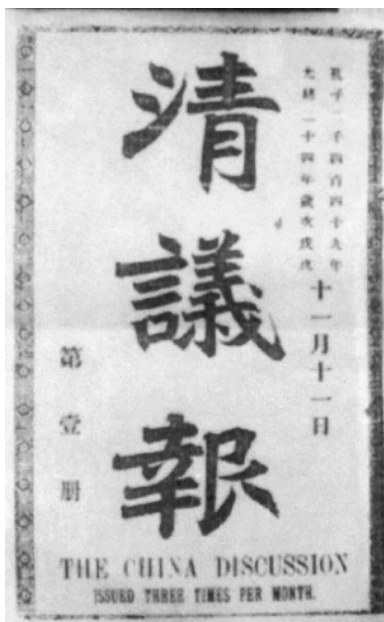
在《清议报》第一百期发行时的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对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中的报馆功能分析尤为推崇。《清议报》的政论中,特别是前期的内容有“尊皇,保皇”、大量赞美光绪皇帝的言辞,光绪被描绘成“以社稷为重,而君位为轻;以民为贵,而身为贱”<sup>④</sup>的圣君,这跟他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相近,并欲借尊王之名来实行变法强国有很大关系。殊不知中国的皇帝与日本天皇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的重压之下,威望不足以号召天下,很难成为凝聚人心的象征,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试图用和平方式实现资产阶级君主制国家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清议报》开始时对光绪帝大加赞扬,但逐渐开始讲破坏,谈革命,讲天赋人权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并对清廷进行尖锐的抨击,对国人特别是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阻止该报的传播。1901年12月,《清议报》在刚出满一百期后因报馆发生大火损失惨重而被迫停刊。

没有灰心的梁启超又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力图创办一个中国报界前所未有的现代报刊。正如他在《新民丛报》第一期中所说：“中国报馆之兴久矣，虽然求一完全无缺，具报章之资格，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中前此未有矣。”<sup>⑤</sup>报纸的取名来源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取名“新民丛报”，可谓用心良苦，表明梁启超办此报的目的就在于启发教育国民，使他们了解、接受新思想，以期达到“至善”的境界。这份模仿西方大型综合性刊物而创办的半月刊，内容丰富、印刷精美，是中国报界前所未有的现代报刊。1911年毛泽东看到《新民丛报》时，爱不释手，“读了又读，直到能背了下来。”<sup>⑥</sup>《新民丛报》着力于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学、康德的哲学及笛卡儿的怀疑论等等。启蒙广大民众，通过“维新吾民”来达到“维新吾国”的目的。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高度评价了这两份报刊。这两份报纸传入国内，深受读者喜爱，虽然清政府一再遏制，但仍然被国内书局翻印后广为传播，终不能制止，影响很大。

### 三

除了报刊之外，日本盛行的舆论宣传手段“演说”对梁启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舆论宣传时他并非凭借单一的媒介，而是善于利用一切可行的方式，在谈到文明开化时，梁启超曾经说过：“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这个来源于曾任日本文部大臣的犬养毅的三利器，被称为“传播文明之三利器”。他积极利用这三种利器——报馆、学堂、演说会进行舆论传播活动，

中国晚清时期，人们喜谈演说，并将其作为新学之象征，梁启超对演说之热衷程度尤甚。这主要来自日本的影响。其实最早把演说这个词汇引入日本并使用的是福泽谕吉。他采用“演说”二字



翻译英文“speech”，他觉得西洋各国对于一切人事都要发表“speech”，这是非常必要的做法，在日本也理应如此。他于1875年5月在庆应义塾内建起了三田演说馆，定期举行演说会，此后，东京各地盛行举行演说会。当时日本报纸的发展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传播范围广，影响面也很大。日本盛行演说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报纸舆论的控制，使笔不能尽言的东西有机会用舌来表达，导致了演说的兴盛。

而演说在中国的盛行，一方面是报纸主要影响范围在封建官僚、士大夫及

后来的青年学子中间，普通百姓识字率低，利用报纸进行舆论宣传有很大局限性，对于知识水平比较低的“国民”，演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舆论传播形式。梁启超一生进行了大约上百次演说，涉及范围很广泛，可以说无所不包，几乎涉及时局的各个方面，演说风格生动感人。清朝末年，大众传播仅有报刊一途，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是当时重要的传播手段，而且近代报刊自出现以来，由于知识水平的局限，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带上了精英舆论的印记，即舆论传播的范围只是一部分受过一定教育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梁启超所重视的“演说”，补充了报纸等其他舆论传播形式，对社会下层民众的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四

从1895年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到1920年流亡后归国这二十多年中，深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舆论影响的他，一直积极进行舆论活动，他那以国家民族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博大胸怀，饱含激情、鼓舞人心的文字，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的宏论，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启迪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 注释：

- ①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上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页
- ②陈华新：《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页
- ③寇振铎：《梁启超与日本综合杂志〈太阳〉》，《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 ④吴嘉勋：《〈清议报〉简论》，《浙江学刊》，1982年第3期，第58—59页
- ⑤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 ⑥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